

DEAFEROL COMBADIIVE DOLIC
HELEN VI COM AMTIVE IOLIC

本书出版获复旦大学中文系『985』二期学术著作资助项目支持

杨乃乔

主
编



比较诗学

读本 (西方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出版获复旦大学中文系『985』三期学术著作资助项目支持

DECEMBER OF COMPARATIVE POE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ETICS

杨乃乔

主
编



比较诗学

读本 (西方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 / 杨乃乔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56-1939-7

I. ①比… II. ①杨… III. ①比较诗学—西方国家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655 号



BIJIAO SHIXUE DUBEN·XIFANGJUAN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

杨乃乔 主编

责任编辑 佟 旭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99 千

定 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比较诗学的翻译与译者诗学的操控

——兼论 21 世纪后孔子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代序)

杨乃乔

近几年来，我们一个学术群体一直在编译一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最初，我们以为这仅是一项纯然的学术编译工作，然而，在策划、选目、翻译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却遭遇了多种学术困惑。在这项学术工作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做一个反思，以引起学界的讨论。

雷纳·艾田伯(René Etiemble)是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20 世纪 60 年代，他发表了《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这篇重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雷纳·艾田伯准确地预言了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从而揭示了当时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倾向于理论化的学术迹象：

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认为它们自己是直接相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ry)。①

众所周知，法国是比较文学研究崛起的创生地，并且在影响研究的学术观念上崇尚跨国文献之整理与考据的方法论，也以此构成了显赫一时的法国学派。当然，法国学派之所以倚重从跨国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展开比较文学研究，这与法国学派诸学者在哲学的层面上崇尚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与唯历史主义(historicism)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国学界受孔德、穆勒和斯宾塞之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规避于汉语本土崇尚文献整理与考据的乾嘉学派，

① 雷纳·艾田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René Etiemble,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 见于雷纳·艾田伯：《比较文学的危机》(René Etiemble,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54.)。按：英文译本原文如下：“By combining the two methods which consider themselves diametrically opposed but which, in fact, must complement each other—the historical inquiry and the 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uld then be irresistibly drawn towards comparative poetry.”

其生成的历史原因是那个时代官方大兴文字狱的结果,当然,其中也潜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逻辑,即乾嘉时期的经古文学家对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从义理的角度空疏释经的抵制。而有着共通性的是,或许我们也可以操用现代学术话语给出一个评判:呈现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学术观念上,乾嘉学派表现在文学研究的面向上也是拒斥批评、理论与美学的,当然,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只有评点式的批评及潜在的理论思想与美学思想。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钟书提及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及其戏剧表演理论时认为:

中国古代民间的大众智慧也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①

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法国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相互呼应着,我们千万不能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有一种错觉,认定西方学术更多的是在哲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推导下把文学研究带向理论的逻辑思辨,实际上,法国学派在那个时代对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考据之讲求,其较之于乾嘉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法国学派与乾嘉学派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获有一致性,然而两者的学术观念与学术视域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法国学派崛起的动力学因素是源起于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的信仰,在方法论上,其是走向国际的文献整理;而乾嘉学派生成的动力学因素是规避于那个时代官方政治的话语暴力,在方法论上,其是止限于本土传统文化之文献的考据与训诂等。

无论如何,法国学派的崛起为止限于本土语境下的文献整理与考据敞开了一方国际性研究视域,也顺应了语际文献整理与跨国考据形成的必然性;当然,同时法国学派也宣告了文学研究在学术本质之观念上与批评、理论及美学的绝交。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早期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P. 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论》(1931)中第一次为比较文学所给出的相对完整的定义:

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而那对于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它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

^① 钱钟书著:《读〈拉奥孔〉》,见《钱钟书集·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5页。

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①

我们都知道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即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确,从文献整理与考据的层面展开文学研究,这无疑为研究者其论题的生成、论点的成立与结论的形成奠定了无可非议的材料基础,但是,文学毕竟是在审美想象的体验性记忆中凝固为物质文本的修辞性语言。如果我们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仅存留下文学史研究作为唯一的学术方法论;那么,文学则会被降解为贫血的及拒斥审美想象的纯粹物质文本。因此,我想“文学研究的贫血者”则应该成为法国学派在崛起后不断被指责的罪名,而乾嘉学派关于文学研究的贫血性则被那个时代的官方政治极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话语暴力所遮蔽,这种遮蔽给后世之学者留下一对乾嘉学者无尽同情的历史可怜,当然,还有对他们之小学功底无限尊崇的心态。

事实上,国际比较文学界内部总是获有一种自我调整的逻辑力量,从学缘谱系上来看,后来崛起的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的美学姿态一反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学术策动的逻辑上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向批评、理论与美学的转型。

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召开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二次会议,可以说,这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第一次与欧洲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正式遭遇。在这次会议上,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雷纳·韦勒克作为美国学派崛起期的首席人物,向与会学者提交了他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这篇报告中,雷纳·韦勒克对国际比较文学界晚近凝滞于文献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的状况给予了全面的质疑,认为由于法国学派讲唱和推行的实证性学术业绩及基于这一业绩之上的得意与傲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②雷纳·韦勒克向法国学派以放送者的姿态所操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激烈的挑战:

我认为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提出的纲领声明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任务。他们把陈旧的方法论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把比较文学置放于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学科主义和唯历史相对论的死亡之手。^③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18页。按:当时戴望舒在《比较文学论》一书把作者名“P. Van Tieghem”翻译为“提格亨”,现按当下学术界约定俗成,重标作者名为“梵·第根”。

② 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③ 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批评的诸种概念》(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82)。

这篇文章以毫不掩饰的批判性学术修辞宣示了雷纳·韦勒克刻意表现的精深的论战性，在呈现美国学者第一次直面法国学派的挑战时，雷纳·韦勒克强调了在没有实事材料考据的基础上，比较文学可以展开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理论性研究，即以美学作为比较视域的平行研究。无论如何，雷纳·韦勒克开始把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以美国学派崇尚的平行研究对以往法国学派主导的影响研究给予了全方位的抵抗与转型式的调整，从而开始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审美性与普适性。当然，关于把美学及其相关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一观念，另一位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后来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一书中给予了更为详实的鼓吹与论述：“如果文学研究降格为一种纯粹的材料堆砌，那就丧失了它的神圣性，因此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就不再被看重了。”^①的确，文学的文学性就存在其审美的观念中，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拒斥文学性，即一厢情愿地把文学研究单一地封闭于非审美的文献整理与纯粹的考据中。浪漫的法国人怎么了？那个时代的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栖居于那个浪漫依旧的法国，以放弃文学性与审美性为代价而成就自己学者姿态的严谨与严肃，这多少让我们有些感佩。其实，他们是希望以不可更改的语际文献考据而力图证明法国对周边国家、民族与区域的介入性影响。

文献考据的背后是一种独断论意识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一般都把雷纳·韦勒克认同为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其实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国际性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于1946年任教于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系且担任系主任的职务。

美国学派崛起后行走至70年代，其在学科理论的体系构架则完全成熟了。1970年，在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雷纳·韦勒克对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给予了更为成熟与丰富的表达：

比较文学将从一种国际的视域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观念中(这是我的观念)，比较文学就与独立于语言学、人种学和政治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完全相等。比较文学不能够限定于一种方法，在比较文学的话语中除了比较之外，还可以有描写、特征陈述、转述、叙述、解释、评价等。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

^① 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Ulrich Weisst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

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比较中。^①

并且这篇文章中,雷纳·韦勒克再度明确地声明:“比较文学不能只限定在文学史中而把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排除在外。”^②

可以说,雷纳·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的肇事曾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轰动一时的具有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此后,国际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开始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也因此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之若鹜的主脉。

其实,我们对法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国学派的挑战之学术背景的陈述,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上众所周知的重大学术事件,我们在此给予反思,是为了在学术发展史的时间维度上描绘出一个历史的坐标: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韦勒克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之报告是1958年出台的,而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艾田伯则于60年代中期,以《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公开承认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的不可遏制性与合法性,一位法国学者以接纳的姿态承认且宣告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这不能不说是源起于法国学派内部的研究观念在走向分化与决裂,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雷纳·艾田伯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从材料考据向理论分析转型的识实务者。当然,雷纳·韦勒克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于1970年的刊发,其更让我们感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坚挺于美学的姿态为美国学派所获取的国际主脉立场。

雷纳·韦勒克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其应该是一位国际文学研究者所同时持有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观念;倘若文学研究仅仅是偏执于其中一个面向,那么在学术观念及研究方法论上,这一定是一位学术自闭者、学术偏执者和单向度的学术激进主义者。

我们特别注意到,雷纳·艾田伯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中所给出的表达:“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其中“historical inquiry”(历史的质询)指涉的即是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其中“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指涉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启用另外一个术语总纳而言,即美学。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雷纳·艾田伯的表述:“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众所周知,诗学就是文艺理论,而比较诗学即是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艺理论沉思,而雷纳·艾田伯对崛起的比较诗学的预言,其学理背后所涵盖的恰恰是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的整合。由此看来,雷纳·艾田伯对比较诗学崛起的肯定获有一种成熟学者的气质、期待与判断:比较文学从不可遏制的理论化倾向中所走向的比较诗学,是基于跨界文学史

① 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见《鉴别:续批评的诸种概念》(René Wellek, “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Discriminations: 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9)。

② 同上书(p. 20)。

研究基础之上所展开的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即国际文学研究平台上具有普适性的美学沉思。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替换一个术语来表述,跨界文学史研究、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也就是语际文学史研究、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当然,雷纳·艾田伯的姿态也证明,法国学派在持有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上,开始能够坦然地接纳且承认美国学派,并心悦诚服地认同了把美学及相关语际批评、语际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之观念与视域中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这是一位学术心理健康的国际文学研究者或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持有的学术立场。的确,从国际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相关持有的研究视域上来评判,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应该是互补、互动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也应该是互视、互见的,文献考据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更应该是互存、互益的。总纳而言,文献的考据与美学的沉思应该是一枚分币的两个面向,两者是在相互依存中而不可剥离的逻辑整体。这两个面向在逻辑上的剥离与分裂,其必须错铸一种偏执且不健康的学术心理,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讨论这种非健康学术心理者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及生存境遇的学术伦理问题了。

说到底,这还是触及学术道德与学术伦理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比较文学研究因美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学的介入,而导致了理论化倾向的加重,其最终必然走向了比较诗学。思考至这里,还有一个导致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加重的关键学术背景,我们也希望在这里简约扼要地陈述一下。

实际上,在美国学派崛起之前,也可以追溯于法国学派崛起之前,比较文学研究走向理论化,其获有一种潜在推波助澜的学术动力,即受制于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影响:这就是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上,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就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的学缘逻辑与本质定义曾给予了介绍,指出在以往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中,“general literature”这个概念经常被比较文学研究者与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所操用,而且具有相当广泛的操用频度。我们注意到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曾就总体文学的本质给出过自己的界定:

总体文学(一般文学)是与国别文学(各本国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总体”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它只要站在一个相当宽大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①

需要提醒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者注意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曾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6—207页。

以其显著的偏执、真诚的保守姿态拒斥美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地,即“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注意,梵·第根在这里所给出的一句危言耸听的评判:即美学的介入让比较文学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他又从美学与心理学的高度为总体文学做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理解与解释,并且在学理上把总体文学置放在与比较文学平起平坐的国际学术领地。

正如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的“本体论”一章中讨论总体文学时所给出的基本陈述,总体文学是指涉在历史的共时性上于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同时发生的一种共同文学思潮,总体文学强调了同一文学现象作为思潮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所发生及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是强调历史的历时性。^①根据梵·第根上述的陈述来分析,在历史的时空观念上,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发生在一段历史短期的横断面上覆盖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是受限於一种理论命题下的,并且这种文学思潮是以理论的总结而给予命名的。关于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存在的境遇及以理论总结给予命名的情状,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给出了具体的表达:

它(总体文学)可以研究的文学事实很多很多,其本质又很不同。这有时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彼特拉克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拜伦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纪德主义……;有时是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情感或艺术之潮流: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纯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有时是一种艺术或风格的共有形式:十四行诗体、古典主义悲剧、浪漫派戏剧、田园小说、刻画、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等等。^②

可见,总体文学强调国际上对波及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文学现象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强调其历史的历时性,但其以理论性所命名的文学思潮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梵·第根在上述所列举的种种“主义”,其的确是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同时发生于国际文学地理空间中的共同文学思潮,并且这种共同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理论性本质,且被理论所命名。这种理论性的共同文学思潮在短期内的跨界性移动非常迅捷,其之所以迅捷,就在于它们是以理论与美学的性质在语际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中所传播,较之于跨界及语际的物质移动与转递,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其来得更为迅速与迅猛。因为,无论是在欧洲宗主国以战争与经济向外扩张的殖民时期,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后现代数码科技打造的全球化时代,思想、思潮、理论与美学等作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文化当然比形而下的物质文化传播

^① 关于总体文学的基本理论概述,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4—107页。

^②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8—209页。

得更为便捷与通畅。

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讨论比较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时,曾给总体文学定了一个定义:

什么是总体文学?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国族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个民族与多个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总体文学就是比较诗学。^①

实际上,总体文学即是指涉国际学术语境下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或文艺理论,总体文学是一种在语际文学史横断面上具有传播性与覆盖性的共通美学思潮,或即文学艺术思潮。因此,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还曾给出过以下的理解与解释:

在概念上我们了解了总体文学的定义,反思在西方 60、70 年代发生并于 80、90 年代波及中国的诸种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及文化研究等,从全球化的视域来说,这些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属于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或者说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客体。只是国内学术界一直对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缺少明晰的解释与定义,以至这个概念在中国汉语学术界失去了有效的学理使用价值,这是很可惜的。^②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比较文学在走向理论化后就是总体文学的升级版,并且在这个升级版中,当然比较诗学成了其中的主脉,同时,也就理解了印地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与美国比较文学学会(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合办的那本著名的刊物,《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而正是这本刊物在其命名上告诉我们,西方文学研究者是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整合一起来给予认同的。而我们从以下这部 1976 年出版的文集命题上也可以见出这一情况:《法国总体和比较文学学会第 13 次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Congress of the SFLGC*)。事实上,走向理论化后的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确有着巨大的交集,而这个交集恰恰可以被一个成熟的、自觉的学科

①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7 页。

② 同上。

概念——比较诗学所命名。

上述我们曾如是说：“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其实，在学理的发展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把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收入了自己的领地，比较文学与理论化十足的总体文学趋同了，这种趋同在学理的本质上也加重了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的倾向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如此认同：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趋同，其也是导致比较文学必然不可遏制地走向比较诗学的一个重要学理因素。

当然，从西方文学及其相关批评、理论的发展系谱来检讨，我们或许还可以把总体文学生成的情状追溯至曾波及与震撼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

无论如何，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理论化倾向，其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事实上，比较诗学也终于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诸多精英学者选择及介入其中的主脉。我们注意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汉语中国文学研究界给予理论性影响的那些欧美教授们，他们大多是在比较文学系任教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因为，欧美高校本然就没有文艺学这个专业。文艺学是从前苏联学界引入的一个学科概念。简言之，这也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为什么走向理论化的重要学理原因之一。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从开始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后，即是在理论化的倾向中势不可阻地发展着自己，因此，比较诗学也一直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当然，这也与晚近30年来西方诸种哲学、美学及相关文艺理论思潮在翻译中对国内学界的渗透与影响有着必然的语际逻辑关系；另外，这也与文艺学在中国高校中文系是一个强式研究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国内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学者往往来自于文艺学或比较文学，而挂名在比较诗学方向下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的专业，其也是来自于文艺学或比较文学。多年来，学术行动的实事也证明，文艺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大家一直在友好且有效的学术交往中互识、互动、互敬与互重，学科的疆界也正是在这样的交集中被跨越了。

无疑，当下是一个学术研究在跨界中互为欣赏与互领风骚的时代。

问题在于，比较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我们又究竟能够就比较诗学给出一个怎样的学理性定义？什么是比较诗学？这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行走走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不得不给出的设问。在《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曾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过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本质：

思考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一个定义，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上成立并且得以展开学术研究的基点——本体，是比较诗学研究者对中外诗学其及相关学科进行汇通性研究所秉有的一种眼光，

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的是,比较视域决定了比较诗学在学科上的成立以研究主体定位,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作为自觉展开研究的前提条件,以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为自己的研究客体,追问包容在两种互文性之间诗学理论的普遍性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从而使比较诗学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全球的、宽阔的、包容的与开放的研究视域中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外诗学的诸种理论问题。^①

当我们思路走到这里后必然要强调: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是在多种视域的交集中重构一种崭新的诗学体系,即我们所说的在批评与理论的思考上汇通于中外与古今而形成的第三种立场与第三种诗学,所以在学科本质上,比较诗学研究者必然是持有第三种诗学立场的语际批评家(interlingual critics)或语际理论家(interlingual theorist)。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在编译这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时,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阅尽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优秀文章与经典著作,然而,并未直接发现任何一位学者曾经在自己的思考中就比较诗学的本质,给出过一个严谨且自洽的定义。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主要是对西方学界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重要文章及相关重要著作的章节的翻译,我们遴选相关学者的文章与著作时,在较大的范围内延展了我们的阅读,然而在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上,我们也没有追问到曾有哪一位西方学者第一次直接、准确且自觉地使用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只是雷纳·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踪迹,是德国学者莫里茨·豪普特(Moritz Haupt)于1878年首先使用了“comparative poetics”一词。有趣的是,整整100年后,即1978年,D.W. 佛克马(D. W. Fokkema)、E. Kunne-易布思(E. Kunne-Ibsch)与A. J. A. Van 左埃斯特(A. J. A. Van Zoest)三位学者共同主编了这样一个命名的读本:《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 ...*),当然,我们猜想在此100年中,一定会有许多学者曾自觉不自觉地操用或定义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关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有限的空间中,我们无法一一追问与疏理出一个发展逻辑细密的谱系。^②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提及一下,于1985年,两位美国学者A. 巴拉坎(A. Balakian)和C. 吉连(C. Guillen)主编、出版了《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一书;于1990年,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Earl Miner)推出了他的那部著名读本:《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文集》(*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当然还有很多。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当下的学者应该是在准确与自觉的学理观念上使用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了。

①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3—424页。

② 关于疏理“比较诗学”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史上发展的逻辑谱系,我们特别期待能有学者就这一谱系的成立给出一个细密的逻辑理清。

不错,比较诗学是一个从西方学界舶来的术语及研究方向,然而我们甚至发现晚近30年来,国际学界对比较诗学及其学理意义的提取,也有着望文生义的误读,如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一样。如在《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在讨论“对比较诗学产生误读的四种可能性分析”时,曾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初步存在于中国汉语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已经存在着的现象,所以国际学界需要逐渐地给予学理上的规范。如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其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出版的刊物《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Alif: Journal Comparative Poetics*)就显出种类杂混的现象。我们在这里只要列举出《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2003年第23期目录上的五篇文章,就可以捕获到这样的感觉:迈克尔·夫瑞考卜(Michael Frishkopf)的“Authorship in Sufi Poetry”(《苏菲诗歌中的作者身份》),塞拉·卡米尔·赛利姆(Salah Kamil Salim)的“New Poetry and Sacred Masks: A Reading in Medieval Poetic Discourse”(《新诗与宗教的面具:对中世纪诗歌话语的一种读解》),安沃·默罕默德·阿伯拉黑姆(Anwar Mohamed Ibrahim)的“Dostoevsky: The Dialectic of Skepticism and Faith”(《陀斯妥耶夫斯基:怀疑与信仰的辩证法》),斯科特·库格(Scott Kugle)的“Pilgrim Clouds: The Polymorphous Sacred in Indo Muslim Imagination”(《朝圣者的玄想:印度穆斯林想象中的多形之神者》),赛义德·塔乌费克(Said Tawfik)的“The Beautiful and the Sacred in Art and Religion”(《艺术与宗教中的美与神圣》)。在这里,我们不妨给上述五篇文章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为初学比较诗学者提供一种划分的学科视域: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①

我们曾就上述五篇文章的本质属性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在这里不妨再度重复如下:“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②陈述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汉语“诗学”是一个从源语“poetics”翻译过来的译入语概念,至少在西方学界“poetics”也有着狭义与广义的界分,狭义的“poetics”概念是专指诗歌研究,而广义的“poetics”概念泛指文艺理论研究。关于诗学这两个层面的界分,已在学界约定

①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7—398页。

② 按:这五篇文章见《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2003年第23期的目录(*Alif: Journal Comparative Poetics*, <http://www.jstor.org/journals/11108673.html>,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4.),“Alif”是阿拉伯文的第一个字母,在这里标识着这部比较诗学期刊是在阿拉伯文化语境下编辑与出版的文化身份,我们以音译的方式译出。

俗成,我们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想申明的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所启用的学理意义是指涉广义的诗学,比较诗学是倚重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学科观念与学科视域所展开的语际文艺理论研究。在文艺学方向下,有一批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的优秀学者依凭自己的学养在从事比较诗学研究,他们可以驻足于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学研究领地,不必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的研究边界问题,因为他们集中精力所需要设问与回答的是“什么是文艺学”的问题;而在比较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下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者,就有责任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研究边界的问题了,因为这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多年来其本然所面对的本质问题。

毫无疑问,在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后数码科技打造的新媒体及其跨界效应使人类栖居的地球村在相对缩小,当然,这种生存景观让当下学界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体地说,这种开放性与兼容性导致了多门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再具体地说,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给比较诗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当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是比较诗学这一学科所遭遇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似乎许多学科都存在着学科本质与边界解体和缺席的危机。

严格地讲,在《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名义下遴选的文章与著作节选,其应该涵盖西方语际文艺理论及相关跨学科思考的经典,如果是这样,那的确可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是太多了,因为比较诗学的边界太宽阔了,西方的语际文艺理论发展史也太漫长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遴选呢?当然每一部读本都有着选家自己的眼光与原则,我们此次在“西方卷”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也必然有着自己的眼光与原则。

第一,在以往的相关“西方文学理论读本”、“西方美学理论读本”及“西方艺术理论读本”所反复选入的已知文章与著作节选之外,我们另辟蹊径重新选目,尽量回避与以往的相关选本在选目上的重复,并且把选目的眼光置放在西方当代学界。

第二,以贴合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阅读与接受的眼光进行选目,因此所选入的相关理论文章与著作节选比较基础与稳定;所以这部“西方卷”特别适用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或西方文艺理论的教学所用。

第三,《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所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更多是贴合于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而完成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套读本必须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其不仅简单的是一部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新面孔读本。

第四,需要明说的是,我们在遴选时特别注意征求与尊重研究生自己的阅读眼光,因此他们的建议与推荐在当下的选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意图是“西方卷”选目的眼光与原则,应该距离作为现下或未来读者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越近越好。当然,选家的眼光与原则不因为是研究生而放低了要求,而一定是经过提纯、提炼与提高后的学术视域。

关于《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我们也有着自己的选家眼光与原则,并且这种选家眼光与原则的兑现,让我们收获了怎样恰如其分地编选一部“中国比较诗学读本”的学术乐趣。

第一,我们把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准确地带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中,以此为王国维以来的、自觉的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勾画出一脉发展史的逻辑谱系。其实,关于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发展史的基本逻辑谱系,从我们选目的排序上,一眼即可以见出。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卷”读本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所以还有很多优秀学者的比较诗学研究文章与著作节选无法被纳入其中。

第二,我们选目的眼光与原则也必然扩展于中国本土之外的国际学术领域,把那些栖居于西方学界的华裔学者以英语书写的关于中国诗学研究的文章与著作节选纳入其中,以此告诉阅读这套读本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古今中外知识结构汇通的视域下,比较诗学在解决中国本土诗学文化传统的问题时,那些以英语书写、思考的比较诗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并且在研究与思考的观念上,其对中国本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者应该也可以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以此我们也能够切实地证明,比较诗学研究的展开必须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第三,我们特别希望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为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提供一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国际性学术视域,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不仅守护为中国本土学者的私人话语(本土话语),也更应该敞开为国际学者的公共话语(国际话语)。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卷”能够使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阅读中获取这样一种学术体验:即一位国际性比较诗学研究者驻足于异质文化的学术立场,可以操用他者视域而完成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而获取打通中外学术的新鲜感与通畅感。

第四,我们特别希望以“中国卷”的选目告诉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较之于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学术语言的操用、学术观念的敞开、学术知识的融通与学术心理的健康等方面是优秀的。甚至在多种维度上,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比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要优秀得多与厚重得多。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在中国汉语语境下的崛起与发展,其不仅是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坦然地敞开自己的学术视界,以获有一种阳光且健康的学术心理,以此与国际学界接轨;当然,其也必然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持有一种学术自信心,在了解了西方后,也用不着对西方学者在绵密的讨好中贡献那种“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盲目崇拜。

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诗学研究就是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国际化,研究主体是驻足于一方国际化的平台上,以敞开的视界观览、思考本土文学及相关理论与外域文学及相关理论,而不再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姿态把文学及相关理论研究狭隘地理解为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或者以一种偏激的抵抗姿态把外域文学及其理论仇视为一种文化侵略。

客观地讲,我们在翻译《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其中大部分文章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理论话语在我们的翻译中“失语”而完成的,因为,这两部读本中关涉西方学者诗学与华裔学者诗学的文章是从英语翻译为汉语的。大卫·达姆

罗什(David Damrosch)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2003年他向国际学界贡献了《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一书,其中他以三重定义的方法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重新给出了一个界说:

1. 世界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的一种椭圆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
2. 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书写。
3. 世界文学不是文本的一种固定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a mode of reading)。^①

大卫·达姆罗什特别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翻译对世界文学形成的内在推动作用。当然,在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跨界移动中,翻译直接推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解码与转码,这种语言的间际解码与转码推动着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语际中走向相互的融合。大卫·达姆罗什所界定的因翻译推动所形成的世界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客体,也是比较诗学得以建基之上所可能形成理论表达的背景语境。不仅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审美性书写,而比较诗学也是在翻译中获益的理论性书写。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批评家与理论家栖居于本土,操用本土母语与本土视域对异域诗学进行研究时,其在本质上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因为他们的研究必然要依赖于翻译的诗学读本;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批评家与理论家栖居于异域,操用异域语言与他者视域对本土的母语诗学进行研究时,其在本质上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因为他们的研究对异域诗学读本的阅读也是翻译;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诗学因翻译向异域做语际移动时,其在本质上更是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我们想说的是,关于这部《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其中文章与著作节选的翻译,其本身就构成了比较诗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译者以自己的翻译行为推动了诗学在语际之间的移动与融合,诗学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

不错,比较诗学是在诗学翻译中获益的书写。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是一部完全翻译的读本,而《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部分文章与著作节选也是从英语翻译为汉语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的是,“西方卷”是从英语在解码与转码中重新书写为汉语的一次翻译,而“中国卷”中的部分翻译文章与著作节选是在解码与转码中重新书写为汉语的二次翻译。关于“二次翻译”是在比较诗学研究中一个应该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我们在这里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如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撰写的《中国诗学与禅学》一文。

《中国诗学与禅学》是陈世骧用英文书写的一篇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世骧把其所涉及的相关中国古代汉语文献翻译为英语,当然这篇文章也更是作者操用英语在书写中对相关中国古代诗学与禅学的审美观念给予解码与转

^① 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